

第一章

艱險奮進 躬耕苦讀

張隆溪 1947 年出生在四川成都，七十五歲的他回憶起童年，有趣的是他仍然清楚記得在三四歲之間做過的一個夢。成都氣候比較潮潤，多蚊蟲，床上都罩着蚊帳。他記得那時曾好幾次做過同樣的夢，在睡夢中一睜眼，就看見一個巨大的金臉，佔滿了整個蚊帳，嚇得他驚醒過來。媽媽讓他不要害怕，說那是佛，是保佑你的。媽媽並不信佛，他自己更從來不信神拜佛，但那個夢卻留下記憶，使他有時會產生一種神秘感，覺得自己在一生成長過程中，雖然經歷過不少坎坷，但在關鍵時刻又常有人幫助，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得到某種眷顧。

張家氏系

張隆溪父親張崇璣原籍遂寧，年輕時移居成都經商，曾結過兩次婚。第一個太太生有三子，過世之後，他父親再婚，又有三個子女。張隆溪 1947 年出生，在家中排行最小，出生那一年父親張崇璣已年屆花甲了。「父親去世很早，我對他記憶很模糊，但在我三歲時，父親就教我識字。」張隆溪記得父親常帶他坐在成都的茶館裏，用手指沾一點水，在桌面上寫字，教他讀寫。他家裏有《船山詩草》、《經史百家雜鈔》等書。從小父親就給他講《聊齋》故事，讓他讀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說岳全傳》。他說，張氏家族歷來就很重視讀書。

他從小就聽說，家裏幾輩人起名字都依據一首詩，原來清代名臣、治河專家張鵬翮是家中先祖，傳說有年康熙皇帝曾在北京懋勤殿召見了張鵬翮，先祖題詩一首，其後張氏家族即以此為字派詩，每輩各按順序取其中一字為名。

詩曰：「懋勤顧問，知遇崇隆，清正仁厚，進德立功。」張鵬翮兒子用懋字起名，孫子用勤字。張隆溪父親張崇璣是崇字輩，張隆溪兄弟姐妹是第八代隆字輩。張氏家族最有名的是張鵬翮的第四代後裔張問陶，出生時其父張顧鑑為官山東館陶，所以名問陶。他是清朝乾嘉時代的大詩人，當時最有名的詩壇盟主是性靈派大詩人袁枚，洪亮吉向袁枚推薦張問陶，袁枚十分欣賞，對洪亮吉說：「吾年近八十，可以死，所以不死者，以足下所云張君詩猶未見耳！」他讀到張問陶的詩大為欣賞，引為「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。」

張隆溪與張問陶又相隔四代。童年時父親年事已長，張父約在 1958 年去世，那年他才十一歲，兩年後（1961 年）母親也離世了。「父親是漢族，媽媽是滿族，姓關。我記得媽媽很會做飯，這大概跟她家族有關係。成都當年有個非常有名的館子叫榮樂園，館子的大廚跟關家有點關係，每年過年都拿很多吃的來，所以我媽媽跟姨媽都很會做菜，完全可以一個人做一桌席。」

張隆溪出生時已家道中落，他的姐姐跟哥哥都沒上大學。姐姐因為會唱歌，五十年代就參加了部隊文工團；哥哥讀書成績不錯，但未能上大學，只在中專學校學醫，後來當了四川安縣醫院的放射科醫生。張隆溪從小學習成績優異，最早的理想是當畫家，但讀中學之後，對外文也很有興趣，喜歡哲學、文學、歷史。1963 年他初中畢業，喜歡他的美術老師替他在四川美術學院附中報了名，他也參加了考試。美院這種專科學校收生比一般學校早，那一年四川美院附中在重慶收十二名學生，在成都收八名，雖然張隆溪沒有去做體檢，還是被錄取了。那時他的志向已經有所改變，而錄取他的是美院附中，不是正式的大學，所以他故意

不去參加體檢。因為父母都已去世，比他大十多歲的姐姐就像家長，美院的老師找到他姐姐，希望她同意張隆溪去重慶，將來進入美院。但姐姐說弟弟學習成績一直很好，我們家姐弟三人沒有人上過大學，堅持要他讀大學，就拒絕了美院附中的錄取。

「求進步」而不得

但張隆溪始終沒讀上大學。他成長的年代，國家風雨飄搖。父親去世的 1958 年，中國發生三年大饑荒，「其實按我們家的基因看，我父親應該活得很長，但當時太可怕，因為飢餓，很多人都水腫。我父親就是在那種情況下過世的。大饑荒完全是政治造成的，後來有人說是自然災害，其實哪有什麼自然災害？那幾年根本是風調雨順，但當時搞大躍進、人民公社，畝產萬斤糧，虛假冒進的結果是造成了人為的大災難。」

早在數年前的 1955 年，中國就出現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趨勢，基建規模越來越大，項目之多，已超越了第一個五年計劃（1953–1958）的指標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曾提出「反冒進」的說法，但 1956 年毛澤東卻認為對經濟工作中進急情況的糾正是錯誤的，提出「反反冒進」，同時發動「反右運動」。1957 年 11 月 13 日《人民日報》提出「大躍進」口號，在工業及農業上追求「躍進」的數字，號稱二十五年內要「超英趕美」，推動全民大煉鋼鐵、建立人民公社等等。

大躍進發動之時，好大喜功，虛報農產量比比皆是。《人民日報》常用顯著版位報道糧食高產「衛星」，創出高產量的新聞。夏糧畝產數百斤，被虛報至數千斤甚至「畝產萬斤」。虛報浮誇之風帶來嚴重後果，全國食物供應量急降，饑荒更加嚴重。張隆溪成長於物產豐富、被稱為「天府之國」的成都，那時也出現糧食短缺。那年代，中國社會什麼都要分配，買米要政府定期發放的糧票，買衣服要布票，買肉要肉票，買糖要糖票。而且配給都有等級，牛奶、雞蛋要嬰兒或某個級別以上的

幹部才可以享用。現在很平常的東西，當時都沒有。他記得父親長得頗高大，大概有1米78，但他自己身高不到1米6，多少因為正在長身體的階段，遇上了大饑荒。他回憶起那時候有所謂「康福散」，其實就是糠和粗糧混雜的食物。糠就是穀的殼及胚，平常被當成家畜的飼料，但在饑荒之時，卻成了人的主食。他記得有一次，媽媽在街上給他買了個點心，剛拿到手上就有人從旁撲過來，把點心搶了，一口吞下去。他當時還小，嚇壞了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他說那個人也不是壞人，只是餓慌了。

父親張崇璉從前在私人銀行工作，但銀行在新中國成立（1949）之前已經倒閉，「之後就家道中落了，開始變賣家當。我記得家裏有很多瓷器，後來都拿去賣。我家不是最窮的，但也不是很好。」生在中產之家，在火紅年代被認定「出身不好」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講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，把人按家庭出身分為幾等，學生中也是這樣。幹部子弟社會地位最高，從前是地主、資本家的兒女最受歧視，而一般家庭子弟則處在灰色的中間地帶。那時講「又紅又專」，紅的意思是政治上要求進步，加入共產黨和共青團，專是指學習成績要好。「我因為沒有『革命家庭』的高貴出身，加上從小就比較獨立，不容易被接納，所以做不到『又紅又專』。學習成績好反而成為『白專』，在政治上更受排斥，所以我連共青團都沒加入過，更不用說入黨了。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越演越烈，終於在1966年引發了「文化大革命」。張隆溪回憶說，「人被分為高低貴賤的等級，有所謂紅五類，黑五類。幹部子弟紅衛兵公開講血統論，大喊『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兒打地洞。』這口號對一般家庭出身的大部分年輕人，是帶有極強的侮辱性和壓迫性的口號。」

因為父母去世，張隆溪十三歲就住校。姐姐比他大十多歲，先在部隊文工團，後來回到成都八一小學當老師，哥哥則遠在安縣，所以他從小獨立生活。張隆溪念的初中叫二十八中，高中轉到九中。二十八中後來叫金河中學，現在改名為樹德協進中學；九中後來改名樹德中學，在成都都是很好的學校。幾年前二十八中一百周年校慶，還請張隆溪錄製一段視頻在學校慶典上播放。現在成都這兩所中學的外牆上，都有他作

為傑出校友的肖像，不過在張隆溪讀書的年代，情形卻很不相同。中國社會進入政治大風暴的年代，少年張隆溪從生活中了解到出身和階級的觀念，也認識到政治對每個人的影響。「當時我有個印象，因為二十八中靠近西教場、軍區，學校有很多幹部子弟，在學校裏耀武揚威。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學校裏沒什麼地位，他們對我的態度是另一等級，雖然大家都是學生，但他們是一個群，我是 outsider。」他記得，成都最好的學校是四、七、九，其中「九中」幹部子弟比例最高，百分之六十都是省委市委幹部的子女，他們有特權，而他則必須靠自己。那是一個喝牛奶也是一種特權的年代。跟據戶籍制度，人口也不能流動。在「越窮越革命」的意識形態控制下，物質享受和追求快樂的意願都會被壓抑。他記得，當時市面上人們的衣服不是灰藍就是草綠，在物質生活上沒有任何樂趣可言。不過年輕人畢竟充滿了青春活力，除自己畫畫、看書之外，那時候他也常和同學們一起踢足球，到成都杜甫草堂、武侯祠、青羊宮和許多有文化傳統和歷史傳承的名勝古蹟去遊玩，在精神生活中去尋求自己的樂趣。

無樂自欣豫

在這大環境下，他一頭栽進文字和藝術的世界裏，從困苦中找到一絲寧靜。他從小喜愛繪畫，初中開始學外語也就喜歡外語。因為環境關係，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少年多學俄語，張隆溪卻恰好分在英語班。他記得決定不去美院附中之後那個暑假，他找來一本四十年代編寫的高年級英語教材，猛記單詞，又讀英語原文的語法書，英語詞彙量和理解能力都突飛猛進。他因為考試成績優異，考上九中的高中部，那時他的英語水平已遠超過班上同學。教他們班英語的一位女老師特別開明，允許他上課自己看書，只有其他同學答不上問題時，才要他回答。對此，他一直心存感激。

關於學語言，張隆溪有一套理論，「我總結學英文的經驗，你不能一直看自己看得懂的英文書，完全看得懂就沒法進步。也不要看完全看不懂的，那樣就沒法看下去，也不會有進步。你要找比你懂得稍高一點的水平，才會學到新的辭彙，看懂了再往上走。我當時看的是四十年代編的教科書，它比我們當時的教科書深。文革之前書還是很多的，有舊書也有新書，也有原文書。」

他也學過俄文，而且學得比其他同學好，「因為看了查良鏗先生翻譯的俄國詩人普金希（Alexander Pushkin）的詩，很喜歡，初中就自學俄文。我的俄語學得還不錯，最可笑是有一次快考試了，一個俄語班的同學還來問我怎麼記俄文單詞。那個同學是成都市委一位書記的兒子。」那時候他常去成都外文書店，裏面很多蘇聯出版的很便宜的書。除英文書之外，他還買了俄文的德語教科書，開始通過俄文學德文。

為什麼對學語言特別有興趣？他認為首先是一種特別的感覺，也是想了解外面世界的願望。他不喜歡一般的英語語法書，因為例句都很簡單無趣，喜歡看的是不僅講語法、而且有深度的講語言的書。他很欣賞丹麥語言學家耶斯柏森（Otto Jespersen）寫的書，因為「他寫的語法書講哲學，非常有意思，我看得津津有味。」

在回顧少年時代的一篇文章裏，張隆溪引用了陶淵明的詩句：「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」，以此來形容當時的情形。所謂「自欣豫」，就是「自得其樂，也就是做令自己快樂的事情，我從高中就有這樣的想法。那時候最感興趣就是中國古典文學和外文，背很多詩詞；外文其實包括了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。」後來不管外部世界發生怎樣的變化，他總埋頭讀自己喜愛的書。張隆溪是老派讀書人，強調記憶。他回憶自己學外語的經驗時說：「初中到高中那個暑假，我讀一本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高年級英語教科書，自己拿紙片把不認識的新單詞抄下來，用釘書機釘成厚厚的一小本，隨時查看。其實我記憶力不算特別好，但那個暑假進步很大。」但他強調學外語詞彙不能死背，因為字典裏單個的詞好像是死的，

只有意義的各種可能性，而只有在句子裏，在上下文的語境裏，單詞才成為活的語言，才最能體現其不同層次的含義。坊間傳聞張隆溪英文好是因為他背字典，但他完全否認，而且說「這是亂傳，我從來沒有背過字典，背字典是最笨的辦法，應該在活的語言環境中去學外語，尤其在文學作品中去學語言和語彙。背誦詩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，我當然贊成背誦詩詞。」

在任何語言裏，文學語言都是最美的。文學常識看來似乎並不那麼重要，但我們說某個人的中文好，往往是指這個人能背誦一點古典詩詞，寫作時能適當運用帶一點文言味道的詞句。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往往都背得一些唐詩宋詞，這對我們自己的文化修養和文化認同非常重要。張隆溪對香港的教育頗有些失望，因為太講究實用，完全不重視文科，也不重視歷史課教育。這種表面看來追求實效、鼓勵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教育政策，最終卻造成危害極大的社會問題，使得一些年輕人不同意中國和中國文化。沒有認同感，怎麼可能熱愛自己的國家和社會，成為香港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呢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大問題，這種輕視人文教育的狀態必須徹底改變。

十年文革 看清歷史

張隆溪 1966 年高中畢業，恰好遇到前後持續十年的「文化革命」，那年他十九歲，對當時發生的事情記憶猶新。他回憶說：「那是突然發生的，學校突然就宣佈要停課。那時我們期終考試正快結束，以為最多就停幾個星期、幾個月，結果一停就是十年，真是可怕。」文革一來，紅衛兵進駐學校，當時的口號叫「停課鬧革命」。紅衛兵到處張貼大字報，紅色浪潮由北京迅速擴散到全國，其中最難忘的一幕，就是目睹老師們被批鬥。老師們是知識分子，都成了「臭老九」和「牛鬼蛇神」，被掛黑牌，剃陰陽頭，還關進「牛棚」，常被紅衛兵拿皮帶抽打，身心都受到侮辱和折磨。「記得九中有一位數學老師，大家都覺得他人很不錯，年紀

也不小了，因為以前曾經參加過國民黨，被鬥得很厲害。他被關在學校的教學樓上，不准回家，後來受不了折磨，就從樓上跳下來，頭着地死了。」他記得「那是冬天，天氣很冷。早上看見老師的屍體，臉色蒼白而有點發綠。」那畫面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，至今仍歷歷在目。

文革的動亂，在不同政治派系和利益團體的背後支撐下，發展為不同派系紅衛兵的武鬥。成都的紅衛兵分成兩大派，一叫八二六派（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兵團），另一叫紅成派（紅衛兵成都軍團）。他們都以大學生為主，但也有很多中學生跟着，「他們兩派後來武鬥，真的拿槍來打。有一次在成都 502 廠，我親眼看見好幾個人被打死！」因為重慶有很多軍工廠，後來幾派鬥起來，連坦克車都開出來了。最可笑是各派都說自己忠於毛主席，卻互相打得你死我活。經歷過這段歲月，讓他看清楚歷史，看清一切激烈政治運動的一個規律，一個鬥爭的邏輯，那就是一開始需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，把外部敵人都消滅之後，就逐漸把鬥爭的鋒芒轉向內，清理內部，互相爭鬥。法國大革命就先是把皇室和貴族推上斷頭台，後來 Maximilien Robespierre（羅伯斯庇爾 1758–1794）把當年發動革命的許多領袖人物殺掉。俄國革命也是一樣，列寧一死，斯大林就把當年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許多領袖人物都清洗掉了。這幾乎成為一條規律，幾乎所有激進的政治運動都是這樣。他記得文革開始時，老百姓也很高興，因為有權的人都被打倒了，「但後來每個人都被打倒，每個人都倒霉，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，國家的狀況岌岌可危。這就是激進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後果。」

燒書與贈書

中國傳統重視讀書，但在文革當中，知識分子被侮辱性地稱為「臭老九」，是最低下的。「在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元代，有『九儒十丐』的說法，討飯的乞丐是第十等，地位最低下，讀書人比乞丐好不了多少，只是還沒有到討飯的地步。所以『臭老九』的來由是蒙元時代侮辱學者的說法。」

文革時宣傳讀書越多越蠢，知識越多越反動，但青少年時代的張隆溪對此卻深感厭惡，只想全情投入自己的世界裏去。當時的張隆溪手上沒什麼書，而中學（九中）圖書館的書全都被燒光了。然而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，張隆溪先遇上了之前二十八中的潘森林老師，後來又遇見歐陽老先生，一個個在他生命中偶遇的人，出手相助，改變了他的一生。

「潘森林老師其實沒有教過我課，但是我在初中的時候，英文已經很好，許多老師都知道，所以他認識我。剛好要下鄉之前，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，他說他被抄家，書都被紅衛兵拿走了，可是有兩本書，不知何故，沒有被拿走。他知道我要下鄉了，就乾脆把這兩本書送給我，交給我帶到鄉下去看。」潘老師被抄過家，經歷無數次批鬥，但他還記得張隆溪這同學英文好，也信任他，就把這劫餘的兩本書送給他下鄉去讀。

兩本贈書，一本是英譯的《希臘羅馬文學》，這為少年張隆溪對西方文學的了解，打下非常重要的基礎，「這本書介紹希臘羅馬文學，包括兩部荷馬史詩和羅馬詩人維吉爾的《埃尼阿斯紀》，還有希臘悲劇、羅馬喜劇，以及柏拉圖的作品，是厚厚的一本書。書前面有引導讀者了解各種修辭手法的導讀，還有對希臘神話的簡介，讓你知道希臘的神都有兩個名字，一個希臘文，一個拉丁文。例如愛和美的女神 Aphrodite 是希臘文，很多人不熟悉，但如果說 Venus（維納斯），很多人都知道；再如阿波羅（Apollo）是希臘文的名字，他的拉丁文名字叫 Phoebus，每個神都有兩個名字，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，因為研究西方文化和文學，你都要懂這些東西。西方文學有兩個重要的來源，一個是希臘羅馬的傳統，另一個就是猶太和基督教——也就是聖經的傳統。」

另一本贈書是《英國文學選讀》，從莎士比亞一直介紹到十九世紀文學，共選取了四十個作家，每個作家選一部分，「我記得莎士比亞戲劇選了 *Julius Caesar*《凱撒大帝》中兩個很重要的演講，一個是 Brutus，一個是 Mark Antony 的。那本書很好，看來像是十九世紀末美國出版的一本教科書，對我學英文非常有幫助。」

那些年，張隆溪沉醉在書本之中。「我經常找書看。曾經是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圖書館館長的鄧光祿先生，人特別好，他是老一輩，認識我以後特別着急的替我找書看。」他形容鄧老先生為人有點理想化，曾一度想帶張隆溪入川大圖書館借書看。因為他是圖書館館長，跟川大很多人都認識，結果卻根本借不到。整個圖書館封掉了，誰願意去冒這個險，把封存的書偷偷拿出來給一個不認識的年輕人看呢？

潘森林老師贈書後，張隆溪就沒有再見過他了。鄧光祿先生提出替他借書，雖然書沒借到，但數十年過去，張隆溪仍然惦念着鄧老先生的好意。

在鄉野裏讀莎士比亞

1969年某天，突然接到通知，所有的中學生都要上山下鄉去。理論上是說，學生過去受的教育都是封建主義、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毒草，現在送到鄉下去勞動，是要接受「貧下中農」的再教育。實際上那時年輕人在城裏沒有工作，不好管理，武鬥越來越嚴重，送到鄉下去，是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的辦法。其實也不是所有人都要下鄉，幹部子弟，哪怕父母被打成「走資派」，也可以通過各種關係去當兵。那時候參軍也是一種特權，一般家庭的子弟就大多得到農村去。

成都各中學下鄉，按學校分配到不同的地方。張隆溪和九中幾個同學一起，加上十三中的幾個學生，下鄉到了四川南部，在西昌專區下面德昌縣一個遠離縣城的山區。那裏有漢族，也有彝族，地名叫茨達。

這裏位處四川邊境，靠近雲南，他們下鄉的生產隊在一個山谷裏，有一層層的梯田，可以種水稻和油菜，山坡上則種玉米，四川人叫包谷。他每天跟農民一起種田，插秧、挑糞、除草、收割，過農村生活。「我有三年在山區，一年四季跟農民一起幹活。農民對時節的變化非常有知識，哪一天該播種，哪一天該薅草，哪一天該收割，都知道得很清